

陪伴周总理的八年 是我毕生的财富(下)



▲1958年9月周恩来在开滦煤矿



▲周恩来阅览雷锋日记

感受讲述者:46年前,纪东以秘书身份陪伴着周恩来总理走完了最后八年的人生之路。总理逝世后,他转业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任处长;1984年重新入伍,任国务院办公厅警卫处处长。1987年调任武警总部司令部作战勤务部长、办公室主任。1994年任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,授少将警衔。2002年退伍后,担任中共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副会长,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,将他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宣讲周恩来的伟大精神上。

纪东说,总理是一部读不尽的书。总理曾说过:人是应该有理想的,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得盲目。总理深谙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道理,在纪将军看来,无论什么理论,其实用细微的小事诠释起来反而更加鲜活和充分。他在总理身边的八年里,亲历过一次次重大事件,见证过一个一个关键决策,但是,印象最深的还是几个“无情未必真豪杰”的动人瞬间。

律己 是他至死不渝的准则

总理住的西花厅由于年久失修,墙面斑驳,地面返潮。工作人员打算趁他外出检查工作收拾一下。等他回来时,没想到摆设大变:旧窗帘不见了,旧桌椅更换了,后面的走廊处还搭了天棚,这一下,总理火了,说什么也不进屋。经过大家苦劝,他才勉强进去,但是要求必须换回旧窗帘和旧桌椅。他说:“我住的房子修得这么好,有的百姓还是几代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,我能心安吗?”这件事,他在200多人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做了三次检讨,并且反复告诫部长们:“你们不要重复我的错误。”他还多次郑重表态:“只要我在总理位置上一天,国务院的小礼堂就绝对不允许翻修。”

总理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,一直带头过

紧日子。他说:“我十一二岁当家,深知柴米油盐的不易。”他的早餐就是一片面包,抹上一点黄油、果酱,在自制的铁篋子上烤一下,再配一杯豆浆或牛奶,有时会煎一个荷包蛋;晚餐有时就是一碗面条,还有一次就是一个面包、一个煮鸡蛋外加一小碟盐。

总理对保密要求格外严格,生活中依然保留着当年地下工作时的习惯,进门前总要咳嗽两声。只有放在桌面上的文件秘书才能整理,重要文件他都要亲自锁进抽屉里。总理有规定,部长以上领导和知名人士的信,我们不能拆。凡是涉及党的重要机密的电话,他都坚持使用专线。召开重要会议时,工作人员能不能在场,服务人员能不能进去倒水,都会作出明确交代。即便是在车

上,只要事关重大,他都会按动电钮把司机、警卫与后座之间的隔音玻璃升起来,就连侄子、侄女来看望他时,也不允许进他的办公室,而且还给他们定了自己去食堂打饭、不能用招待券看戏等十条家规。总理这么做,绝非不信任我们、不疼爱孩子,而是原则面前没有例外。

对自己做过的批示,一旦发现有失偏颇,总理都会立即纠正。1970年,国防科委给总理写了一份报告,提出要试验生产神经性毒剂沙林。总理批示同意,后来根据国际上的有关规定,决定停止这个项目。一次会议上,国防科委负责人碍于总理曾经批准过不好直说。我看出了他们的矛盾心理,凑到总理耳边说:“总理,这个报告是您批

准同意的。”总理马上明白了国防科委负责人的意思,郑重地说:“当着我的面,你们不要不好意思提出来,不管谁批准的,不对的都可以改,我也一样!”

总理的既聪明又厚道被很多同志称道,越是关键时刻,这种结合越是完美。他的律己,既得益于一贯的严于修身,也生发于始终的相忍为党。有这样一种说法,很多党外人士和海外友人是通过周恩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。此言并不夸张,近距离接触过总理的人,都有一个突出的感受,他是真正的共产党人。在他身上,淋漓尽致地体现着七个一致——信仰与奋斗一致,职务与责任一致,勤政与廉政一致,做人与做事一致,正人与正己一致,任劳任怨一致,独处与公开一致。

真情 永驻大爱在心间

“春天到了,百花绽放,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,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,走了十二年了,离开了我们,他不再回来了。”这是1988年4月,84岁的邓大姐睹花思人,写下这篇题为《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》的散文。总理曾说过,邓大姐对他的爱是“热情和理智交织着”,我有幸亲眼见到总理和邓大姐的一次亲吻。那是1969年9月3日,越南主席胡志明逝世,总理率团吊唁。当时越战未息,大家都为总理的安全捏了把汗。邓大姐虽然最担心,但她一直表现出一种惊人的平静。直到传来总理专机已进入中国领空的消息时,她才长舒口气。那天,我们所有在家的工作人员都聚在客厅迎接总理。他一进门,大姐就快步上前说:“老头子,你可回来了,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在越南亲吻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,你得同我拥抱,

同我亲吻。”大姐的话惊得我目瞪口呆。没想到总理“哈哈”笑着,把大姐揽入怀中,两人温柔而又不失风度地拥在一起,总理在大姐脸上深深地吻了一下,那么自然亲热,那么旁若无人。

总理的真情来自于他一生倡导的平等人格。他常对我们说:“咱们都是同志,只是分工不同”,他的大情大爱其实就表现在对方方面的具体关心上。初中语文课本里收录过一篇课文——《一件珍贵的衬衫》,记述的就是我亲历的一件事。当时,由于司机踩了急刹车,总理的上身前后晃了两下。虽然因为急于开会,被撞女孩儿交由警卫人员送医,但他念叨了一路,直到得知孩子确无大碍只是刚破了上衣时才放下心来,马上叮嘱工作人员买件新衬衣送给孩子:“把人家衬衫刷破了,总要

赔嘛,从我工资里出钱!”

总理心细如针。有一次路过五棵松树时看见仅剩三棵松树,就赶紧让有关部门补栽上,“要不然外地朋友来开会对上不了号的”;“两弹一星”专委会每次开会,他都特地让食堂准备大烩菜,因为“这个会基层同志多,年轻人多,做别的他们吃不饱”;他深夜离开办公室到卧室办公前,都要脱掉皮鞋换上拖鞋。有一次,我想蹲下来帮他解鞋带,他却把两脚收回,说:“这事不能让你做,我自己能解”;烧伤女工王世芬的事迹披露后,他派自己的医生多次去看望,听汇报时连她的例假是否正常都要问到,他想得更多的是怎么通过一个病人的治疗积累护理经验、检验药物效果为更多的百姓造福。在我看来,总理每一次的真情流露,都是他和群众感情连在一起的真实

写照。

有一次,我陪他从外面开会回家,在车上,他给我讲起到石家庄视察时看到一个村子的房屋墙上用石灰水写着“书记出巡地动山摇”八个大字,他边说边比画:“每个字都有一米见方呢”,我随口跟了一句:“那您去视察,还不得天翻地覆啊!”总理没说话,过了一会,他自言自语:“怎么能够这样呢?这样的话干群关系不是颠倒了么?”他多次告诫国务院机关同志:不要有衙门作风,要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。我们的值班室有一部外线电话,号码公开,经常有人打进电话反映情况。我们曾请示他想换个号码,可总理不同意,他说:“改了号码群众再有什么事怎么找我啊?”

(讲述 纪东 撰文 马宇彤)
(摘自《天津日报》)